



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文库

蒋介石与 南京国民政府

Jiang Jieshi and
Nanj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日〕家近亮子 著
• 王士花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文库·

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

**Jiang Jieshi and Nanj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日〕家近亮子 著

王士花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日]家近亮子著;王士花
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

(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文库)

ISBN 7-80190-471-0

I. 蒋... II. ①家... ②王... III. ①蒋介石
(1887~1975) — 人物研究 ②国民政府 — 研究 — 南京市
IV. ①K827.7②;K262.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9125 号

本书根据庆兴义塾大学出版会 2002 年版译出

前 言

我在大学时开始学习中国近代政治史，那是 1980 年代，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革命史观”为中心。一般的时期划分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变法运动——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苏维埃革命时期/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中没有南京国民政府^①的

① 本书所说的南京国民政府，是指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的所谓“四·一二政变”后于 4 月 18 日在南京成立的政府，中日战争开始后该政府于 1937 年 10 月 30 日迁都重庆、中日战争结束后的 1946 年 5 月 5 日又还都南京，与共产党内战时期又迁往广州（1949 年 4 月 21 日）、重庆（8 月 1 日），最后于 1949 年 12 月 7 日移址台北。该政府因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国民党内的反共派系组织的，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长期被视为“反革命的产物”，统治的正当性遭到否定。该政府于 1928 年 10 月 8 日正式公开把自己的英文标记从“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改为“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因此其正式名称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该政府宣布自 1947 年 12 月开始施行中华民国宪法、进入宪政时期。1948 年 3 月 29 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5 月 20 日蒋介石正式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即中华民国政府就成为正式名称。本书贸然在此名称前加上南京的原因在于，孙文自 1912 年起一贯主张定都南京，可证明南京国民政府是正统政府，在这一点上该政府遵循了孙文的遗教。

容身之地。

在中共党史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终归被视为是发端于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政变”的“反革命的产物”。在中共党史的框架内，讨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正统性，易使人与中共否定自身的国民革命政策、容忍舆论偏向“恐赤病”相联系。因此，可以认为，今后一段时间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历史评价，不会有什么变化。

但是，近年来，学术界对南京国民政府所进行的外交及国家建设给予了一定的评价。当然，构建中国近代史的中心势力，是一贯领导着代表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国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是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正当政府。其政策、“历史遗产”应定位于近代史的主流中，应肯定的给予肯定，应批判的给予批判。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却长久没有做到。因此，有关中国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研究的积累，要比中共党史的少得多。

1980年代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题集中于“为何中国共产党战胜了中国共产党？”查尔姆斯·约翰逊（Chalmers A. Johnson）、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及许多研究者对此做了分析研究。但是，几乎没有研究是以国民党为主体进行分析的。仅有美国国务院的《中国白皮书》代表了这样一种视角，并成为定论。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领导着正当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国国民党，为何容许其敌对势力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增长，并最终失败？”其基本原因是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中国国民党的权力渗透不够。特别是，虽然把孙文的“以党

治国”^①作为党纲来提倡，但却没有充分渗透党的权力，不得不说这是致命的原因。

据2000年进行的人口调查统计，中国人口有12.9533亿人。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员达6451万人，占总人口的5%。也就是说，20个人中就有1人是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的确可以说是“以党治国”的典型。而且，很显然，其统治的基础，与其说是意识形态，倒不如说是占绝对多数的党员，以及像网络一样遍布全国的党组织。共产党的组织触角渗透到了从城市到农村及山区的所有机关、组织，其数量达351.8万个。虽有执行政策不彻底、中央与地方脱离、党的官僚腐败等问题，但是，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所有领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大的原则并没有崩溃。而且，只要共产党能给党员提供社会资源，这种体制今后还会继续。

在民国史上，如果中国国民党作为执政党能实行与共产党同样的统治，即实现“以党治国”的话，那么，国民党的统治就会更加牢固，就能阻止其敌对势力共产党势力的增长。

但是，国民党却没能贯彻孙文提出的“以党治国”方针。本书认为其原因如下：（1）孙文理论的“非精致性”与不确定的解释权，现实政治状况与理论实践之间的脱节；（2）孙文去世后，没有确立中央的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央权力机构的转变；（3）政策如此缺乏连贯性阻碍了党员的补充与党组织的扩大这一最为重要的权力渗透过程。

① “以党治国”原文见之孙文于1921年3月6日在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所作的演说。孙文在演说中主张，必须“训练本党党员，宣传本党主义”，首先从“党人治粤”开始，再向全国推广。即以党员统治国家为基本。但是，后来在中国国民党内部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以主义为其基本”等。

而且，权力渗透不够意味着中国国民党不能垄断社会资源，因此不能向党员提供。党员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是“单方的援助”关系，内战后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大陆时期的蒋介石，既缺乏可以弥补这一状况的领袖魅力，也没有极为充分地确立“独裁”统治。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序 论	1
第一节 分析的框架	1
第二节 研究动向及存在的问题	5
第二章 孙文北京之死及其政治效果 ——对中国国民党的北方认识及其政策的 影响	17
第一节 问题所在	17
第二节 辛亥革命后的南北问题	19
第三节 孙文北京之死及其政治效果	31
第四节 结 语	42
第三章 蒋介石的“反共”构造与“四·一二政变”	44
第一节 问题所在	44
第二节 国共合作时期的蒋介石	45
第三节 “四·一二政变”之分析	61

2 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

第四节 结 语	71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及其正统性的确立	73
第一节 问题所在	73
第二节 政权内部正统性之确立	76
第三节 政权外部正统性之确立	101
第四节 结 语	110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权力机构的变迁与蒋介石	112
第一节 问题所在	112
第二节 训政时期最高权力机构的变迁与蒋介石	114
第三节 战时体制下的最高权力机关与蒋介石	128
第四节 结 语	
——实行宪政与蒋介石权力之确立	133
第六章 蒋介石“安内攘外”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 国家建设及外交战略	135
第一节 问题所在	135
第二节 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再考	137
第三节 “安内攘外”时期的国家建设	144
第四节 “安内攘外”时期的外交政策	155
第五节 结 语	163
第七章 关于中国国民党党员与党费问题的考察	164
第一节 问题所在	164
第二节 从兴中会到中国国民党成立	166
第三节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到三届三中全会 (1930年3月)	169

第四节 从三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	173
第五节 六全大会以后	179
第六节 结 语	184
 第八章 南京国民政府权力渗透的一个侧面	
——从党的基层组织来看	186
第一节 问题所在	186
第二节 区分部的作用及组织工作实况	189
第三节 党团的成立与作用	202
第四节 区分部的作用变迁与小组的成立	207
第五节 结 语	214
 第九章 结 论	216
 后 记	222

第一章 序 论

第一节 分析的框架

如前言所述，本书所称南京国民政府，是指发端于1927年4月12日所谓的“四·一二政变”，4月18日成立于南京，又于1928年10月10日作为全国政权起步的代表中华民国的政府。中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30日，该政府迁都重庆。战争结束后，1946年5月5日，又迁回南京。国共内战时期，又相继迁都广州（1949年4月21日）、重庆（8月1日），最后于1949年12月7日，移址台北。仅仅20余年间不得不数次迁都的事实，说明该政府受到的来自政权外部的压力之大。

不言而喻，南京国民政府是一贯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也是孙文留下的政府。因此，它遵从孙文遗教“国家建设计划”^①，承担了进行国家建设之政治任务。但是，由于孙文理论本身的不精确性及未承继足以实现它的权力，加上政权内部并未确立其解释权，政权外部又有他国的侵略和国内敌对势力“决以生死”的挑战，使得完成这一政治任务极为困难。尽管如此，南京国民政

① 指基于孙文的《建国大纲》而来的“军政、训政、宪政”这样的国家建设程序。

府最终都没有放弃实现这一课题。其原因如下：（一）对南京国民政府来说，继承并实现孙文遗教，是保证其统治正统性的绝对条件；（二）国家统一后实施训政，因其是事实上承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理论，易于统合党内意见；（三）孙文理论以创造近代国家为最终目标，实行它，易得到政权外部的一定的评价，是维持其政权的正当性所必需的。

要在现实政治环境中，实现已有的计划，需要在理念与现实的磨合中决策。南京国民政府经常在“应采取的政策”与迫于政治现实而“不得不采取的政策”中间摇摆不定。是完全靠军事镇压统一全国，还是与地方军事将领妥协尽快实现统一？是先与国内的对敌势力斗争，还是先抵抗国外的侵略？是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允许地方分权？是经济建设优先，还是政治建设优先？是实行民主，还是强化统制？等等。这种种政策的选择，关系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存亡。

面临这样的选择，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意见也未必统一，反而常现不同意见的对立。可以说有关决策方面，大致存有两条路线。其一是，尽量忠实地实施孙文理论，以作继承其权力的依据，主张继续“革命”，最终在党内确立与孙文相匹敌的权力，继而在国民大会上就任总统，这是蒋介石及其拥护者和信徒的路线。其二是，避免权力集中于蒋介石个人，要把蒋介石的权力限制在军事方面，即使有时“违背孙文计划”^①，也要以集体领导体制阻止个人独裁，较之“革命”，更注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上注重尽快向宪政过渡，这是以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为中心的所谓“党内民主小组”的路线。

这两种路线在反共、创建富强统一的国家、通过交涉来提高国际地位之基本外交路线等方面是一致的。但在对孙文理论的解释及其政治经济建设方面，方向上大不相同。可以说，这两条路

^① 橘朴：《国民政府组织法批判》，《协和》1928年10月3日。

线各自有其连贯性。但是，两者交互掌权，其政策的转变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中国国民党非常重视基于“合法手续”的制度化，因此，其党的组织法在20余年间竟几度修改。当然，国民政府的组织法也每次随之改写。可以说，这种制度上的转变导致政策的不彻底和不连贯，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力渗透不够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有一个普遍的研究课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虽被许多研究者论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仍有讨论的余地。这一课题即是，在国共斗争中，为何国民党最终失败，而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有关共产党取胜原因的分析，已经有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关于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讨论还不充分。从历史研究的妥当性来看，今后必须加强对正统政府的国民政府以及领导它的中国国民党的研究。

但是，1949年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共产党的历史观和资料垄断，阻碍了基于自由思考的历史研究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历史研究有了某种程度的自由，资料大量开放，有关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终于能在中国内外展开。

本书主要目的之一，在于分析一贯领导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国国民党败给中国共产党的原因。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在还不具备足以控制全国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断行北伐，又相继与中共武装、日军作战，致使军队疲惫，军费长期增长而致社会、经济混乱。抗战结束后军事力量尚未恢复又与共产党内战。从成立之初即断断续续加在一个执政党身上的这些“军事责任义务”所带来的不可知的负面影响，决不可从失败的原因中排除。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从兴中会时期就没能充分向中国社会渗透。也就是说，党的权力向社会渗透不够，具体而言，指党员的“质量”不够，党组织特别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充分。由此，也必会影响中国国民党的政治构造导致国家权力渗透不够。

中国国民党自其前身兴中会以来，在清朝及袁世凯统治下不

得不作为非法组织活动，因此，缺乏在中国国内扩大组织的机会，特别是北方几近乎空白，其渗透程度地区差异较大。孙文于1919年10月设立中国国民党，当时最关心的是全国统一。关于统一的方法，较之党组织向全国发展扩大党员以获民心，孙文更注重军事控制优先。这是实践军政理论，但孙文的矛盾在于他自身无法筹备足以实现其理论的军事力量。为弥补其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孙文接近苏联，走向国共合作之路。

从结果来看，国共合作给国民党留下了两项正面遗产。一是创设了党的军队，再就是孙文的三民主义在全国普及。同时，它也留下了负面遗产。一是党内分裂，再就是容忍了国民革命名义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扩大。从之后的历史来看，不得不说负面的遗产大于正面的。特别是，国民党在扩充党员及党组织方面，没有自己独特的手法和充分的经验，从苏联引入党组织法，把动员党员的主要任务委托给共产党员，让共产党有很大影响力的农民协会、工会等团体整个加入，以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其结果是使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失去了许多党员和党组织。

为开始实施训政，中国国民党强调党员与党组织的重要性，但是，党员的“质”的规定与组织的作用、构成随着中央权力的转变而变化，不能采取连贯的政策，没能取得实际效果。特别是在吸收党员及党的最基层组织形成过程中，这种偏差显著存在，阻碍了党的权力向社会渗透。本书假定，党的权力如此渗透不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自身权力渗透不够的最大原因，从结果来看，也是败给中共的原因。

本书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分析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在时代的潮流中有一定的正当性，在形成近代国家基础及提高国际社会地位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在制定法律、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完备户籍、发展交通、统一货币、设立中央银行、整顿税制、确立学校制度等国家基础建设方面，该政府所作的努力，以及通过外交交涉提高国际地位方面所作的努力，作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继

承的遗产，应给予客观评价。没有这样的分析，就不可能真正对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再评价。

但是，在1932年12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以后，上述国家建设是由蒋的党内敌对势力来推行的。这一时期，因蒋介石专心彻底“剿共”以求军事统一国家，在国民政府内部，形成了理想的党政军分权体制。

第二节 研究动向及存在的问题

制约以往南京国民政府研究动向的因素，大致有二：一是作为中共党史的反面史的宿命论；二是各个时代的政治影响。就第一点而言，“中国共产党是胜者，国民党是败者”之构图被用于整个近代史，不能抹去历史的“负面”的印象。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国国民党的宿命，今后也不可能完全抹去。尤其是根据共产党的革命史来对近代史进行时期划分和分析的方法，有许多时候脱离了历史事实，把重要的历史现象从其框架中排除，不利于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再限于共产党中心史观，中国内外正在努力确立其中华民国史观。在这种倾向中，应再确认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当然是中华民国的正统政府。当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府机构、政策、制度等等都应作为理解时代的主要历史内容来看待。关于中国共产党取胜的原因，长期以来的研究认为是大众动员（特别对农民），这种分析框架本身非常重要，但是，仅仅如此，不可能重建历史。应认识到，共产党史终究是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展开的一个分支，应在构筑作为主体的国民政府史或中国国民党史的基础上来重新建构。如像以往那样，将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中共党史的反面史来研究，就不可能重建真正的中国近代史。

第二点可说是中国研究整体的问题，但必须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研究易受现实政治动向及要求的影响，而且研究成果易被政

治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战前的日本及二战后的美国都严重地存在这种倾向，但这一问题可以作为地域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来认识。塞缪尔·Z. 克劳斯纳 (Samuel Z. Klausner) 在《社会科学的国有化》^① 一书中指出，“以政治学为中心，美国的社会科学被‘国有化’了”，“美国的社会科学全部被强迫服务于国家利益，在这种意义上，被‘国有化’了”。矢野畅在《地域研究与政治学》^② 一书中，认为地域研究“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较短”，是与“战争目的”直接关联的学问，矢野还指出，这种地域研究所具有的历史背景的影响，直到今天都没有解决。

这种“地域研究的陷阱”^③ 也明显地存在于南京国民政府研究中。如前所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南京国民政府研究兴盛的主要原因。现在中国研究者的课题是：不受政治状况的左右，继续自己的研究；评价已往的研究成果时，必须顾及其时代的影响。考虑到上述因素，在此把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历史分为中国、日本、美国部分，按时间顺序整理如下。

一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中日战争结束

这一时期，中国的出版界有三种倾向：①着力出版国民政府的法规大全、各种行政法等有关法律的书^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① Samuel Z. Klausner, "The Bid Nationalize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Samuel Z. Klausner and Victor M. Lidz,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6.

② 矢野畅：《地域研究与政治学》，讲座政治学《地域研究》，第3页，三岭书房，1978。

③ 矢野畅：《地域研究与政治学》，第10页。

④ 中央书店编《国民政府现行法规大全》，中央书店，1927；民国法政学会编《国民政府省行政法》、《国民政府市行政法》、《中央行政法》，民国法政学会，1928；民智书局编译所编《国民政府法规汇集》，民智书局，上海，1929；王均安编《现行地方自治施行法释义》，世界书局，上海，1929；王后哲编《现行县政法规汇编》，大东书局，上海，1932；中国法律编辑所编《最新国民政府法令大全》，太平洋书店，上海，1932。

的同时，着手完备法律，向国内外显示其法治姿态。特别是1933年开始出版了研究宪法的书^①，可见其向宪政迈进的意志。自北京政府时期以及孙科手下受重用并有留学经历的技术官僚负责这些法律的完备工作。从中可发现其特征。这样的姿态有助于了解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方向。^②出版了有关孙文的三民主义及其他著作的书。透过这一时期，即可了解有关三民主义的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出版了不少关于三民主义概要的书^③。同时，出版了胡汉民、周佛海、施存统等政府要人各自解说三民主义的书^④。这些解释之间有微妙差别，可知政府内部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并不是铁板一块。另外从出版动向也清楚可见为适应各个时期的政策，对三民主义做了重新解释。^⑤出版政府要人的言论集。这一时期，盛行出版政府要人的思想及言论集^⑥。这些在今天成为第一手资料，是了解各个时期不同人物政治影响

① 黄郭：《中华民国宪法史料》，1933；陈茹玄：《中国宪法史》，1933；潘树沈：《中华民国宪法史》，商务印书馆，重庆，1943；许崇灏：《中国政制概要》，商务印书馆，重庆，1943。

② 《三民主义精义》，三民公司，上海，1927；曹雪松、戚惠农：《三民主义浅说》，和平书局，上海，1927；史寒非、曹雪松：《三民主义问答》，大东书局，1928；曹雪松：《三民主义大纲》，大东书局，上海，1928；黄旭初：《民权主义概要》、《民生主义概要》，世界书局，上海，1929。

③ 甘乃光：《孙文主义研究集》，大东书局，上海，1927；胡汉民：《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上海新智书局，1928；周佛海：《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新生命月刊社，上海，1928；施存统：《中国革命与三民主义》，复旦书店，上海，1928；《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发扬》，山西省党部宣传部，1928。这本书是在阎锡山领导下出版的。

④ 《冯总司令在首都之讲演》，三民公司，上海，1928；《党国要人戴季陶最近言论集》，大东书局，上海，1929；《党国要人胡汉民最近言论集》，大东书局，上海，1929；《党国要人吴稚晖最近言论集》上、下，大东书局，上海，1929；《汪精卫集》第一至四集，上海光明书局，1930；《党国要人言论集》第一至三集，中央书局，1934。